

人民、情系人民。”^①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彰显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突出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立党为公的建党宗旨始终是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指引着中国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将党的诞生地建设好、宣传好。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渔阳里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近年来,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上海是党的诞生地。2019年11月2日,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②百年来,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之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共产党人梦开始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上海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三,以上海“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契机,把光辉的渔阳里建党历史与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传承好。红色历史是上海的荣耀,城市内留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渔阳里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据2010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统计,全市红色文化资源共计657处,现存444处;经过十年修复,至2020年上海的红色遗址达612处。这些红色遗址具有地位重要、时间集中、区域集中等特点。对这些红色遗址进行统一管理,发挥其资政育人作用,不仅有助于当下开展“四史”学习,也有助于深化改革开放。

近来,上海开始了红色资源的立法工作,提出打造“红色一平方公里”风貌区,即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囊括方圆一平方公里区域内众多革命遗址,其中就包括新、老渔阳里,以及过去少有人知的博文女校、维经斯基故居、又新印刷所等。通过对这些红色革命遗址的改造与保护工作,直观而立体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初建至正式成立再至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是初心孕育之地,是中国革命和百年长征的出发之地,而这里就是上海的革命中心之地。

(本文承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斌教授提供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忻平,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阳,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00444)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

杨奎松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何谓“相结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③很显然,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形成的,目前被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这个会议文件,与其后历次代表大会所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相比,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这个用来规定和说明“中国共产党”目标、任务、方法,及其组织条例的“纲领”性文件,只简单说明并规定了作为“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却没有一处具体谈到,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在中国应该怎么做。它甚至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做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

①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5年7月2日,第1版。

②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第1版。

③ 《增强党的团结 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私有制”以及必须“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等规定。^①

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时代的党史著述对中共一大这方面的表现,是很难给出高度肯定评价的。从1951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第一部官修党史著述,即胡乔木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相关表述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相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年间列宁等人就对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革命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并且通过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完全没有反映到中共一大的讨论和文件中来。结果,中共一大仅仅完成了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任务,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只能由中共二大来解决。^②

为什么中共一大解决不了,一年后中共二大就基本解决了联系中国实际这个问题呢?原因确如胡乔木书中所言,是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只不过,改革开放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证明,共产国际开始在远东具体着手实施列宁主导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提出的政策主张,已经是在它发起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运动之后的事了。通过举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亲自出面接见国共两党赴会代表、通过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直至于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办法,共产国际一步步克服了中共党内反对的力量,将原本幻想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共产党人,推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线。

在中共建党史研究中,长期通行着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叫“早期共产党人”。前者用来指中共一大前参加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人们;后者用来指一大后党的组织还不十分稳固时期的党的成员。这两个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在强调早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织和早期参加共产党的许多人,虽然同情俄国革命,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自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入门,对未来道路及其理想的选择,多半也还处在一种比较朦胧的状态。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两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正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中共一大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成员多半都没有加入共产党,中共一大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50多名党员中,因信仰而死或坚持主义到底者,只有大约20人。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为什么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党的这段历史。他明确讲,整个党的幼年时期,直至长征之前,一方面因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对最重要的革命法宝,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无经验;一方面因为我们当年“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或“懂得不多”,因此只能“一切照搬苏联”,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不懂得也不知道要把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所改变呢?到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说,我们“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那是“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至于懂得理论要联系实际,“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他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③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② 转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③ 参见《〈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1页)《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796页)《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6、383页)《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339页)。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在引进、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时候,曾经存在着怎样的困难和障碍。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问题,更多的恐怕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自身马克思主义化的困难问题。仅以参加一大的代表为例,他们中确有阅读马克思著作略多,也比较熟悉马克思某一方面论述者,但很明显,与会者中很少人读过列宁的代表性著作,更不用说熟悉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应用策略了。李汉俊等少数人在一大会议期间固执己见,会后甚至萌生退意,不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张,恰恰是他们对与会者相当多数依据共产国际二大文件坚持列宁主义的立场和策略,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的表现。^①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一情况,就理当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这一区别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列宁主义的意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列宁创造了一个适合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自身实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如,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②这里说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列宁主义”。换言之,没有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基础上,与时俱进创造出的新理论和策略,也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这是因为,简单地拿形成于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应用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俄国社会来,最多也只能成就一个二月革命,成就不了十月革命。

由此不难看出,就中共早期历史而言,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共“列宁主义化”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生搬硬套《共产党宣言》——哪怕是宣言后来的各个序言的观点——作为经济发展程度基本还停留在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又是半殖民地,又是军阀割据的落后中国,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很快建立起一个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但是,由于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同样基本属于农业国的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列宁主义,有了用列宁主义观点建立起来且能够将俄国革命的策略经验推广到东方落后民族中去的“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特别是由于列宁能够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③及时做出了联合并援助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通过建立共产党”来“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的重大决定,^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1922年中共革命“两步走”方针的制定,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列宁主义对早期中共指导帮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过中共二大扭转了一大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外,尤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以及思想斗争几方面极具实用性的独特的创造和经验。这些创造和经验究竟有多重要呢?彭德怀曾经回忆过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1933年底他“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1936年六七月间),K. B. 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1929年)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4年),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53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27、124、131—132、152—153、195—196页。

②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要么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再走向社会革命,要么只能被欧洲先进国家同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带入共产主义的观点的概述与讨论,可参见刘洪刚《马克思论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1期;孔川、方世南《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与方式: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冯钢《马克思的“过渡”理论与“卡夫丁峡谷”之谜》,《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等。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年8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4—715、717—718页。

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①

《两个策略》指的是列宁于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小册子。列宁突出强调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实行革命两步走策略,绝不能设想一步迈过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反复论证争取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和尽最大努力争取农民群众,以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必要性。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加速把它引向社会革命。^②《“左派”幼稚病》指的是列宁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他在书中着重分析了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由少数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们来领导,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必须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并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还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了革命的艰巨性和策略灵活性问题,明确提出要掌握一切可能的斗争方法,包括必须尽最大努力以求能够获得大量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③

不难想象,1933年底毛泽东读到列宁的这两本小册子后之所以会那样兴奋,并且当成宝贝似地马上送给彭德怀去读,一方面说明他的确从中获得了他认为极其具有启发性的革命理论和经验,一方面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入党13年还没有读到过像列宁这两本小册子这样能够为他答疑解惑的马列著作。据称,到延安后,毛泽东仍对这两本小册子爱不释手,经常阅读,并且在书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圈圈点点,写了不少批语,还标上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的字样。据中共建国后做过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龚育之的了解,“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讲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④

毛泽东加入中共前后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他说自己读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⑤这多半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代入阅读后的共同感受。但要读懂宣言论述和批判的深刻的理论依据,要从中找到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及其斗争方法,无疑是困难的。因此毛泽东曾坦言,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才在理论上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⑥

毛泽东会有这样的感受,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马恩的著作,是以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为研究论述对象的,既未留过学,也未读过大学相关课程的毛泽东,自然不那么容易读懂。而列宁的著述则大不同。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列宁的著作容易读,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⑦再加上列宁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和中国类似的落后国家中较普遍的问题,他得出的许多判断、提出的许多方法,也都是和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以后时时会遇到、会思考,总想着如何应对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因而具有高度的实用性。

当然,即使在国内,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懂得一两门外语的早期共产党人中,中共一大前后能读俄语的也没有。更何况俄国十月革命前两国间文化交往却很少,以至中国舆论界知识界当年了解俄国革命,只能经由欧美日本的通讯社得知一点很不准确的信息。直到1918年底1919年初,才逐渐开始了解苏俄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但即使进入1919年,中国的报刊上来自苏俄官方的声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62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8—257页。

④ 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9—30页。

⑤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379页。

⑥ 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0页。

⑦ 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0页页下注。

音依旧很少。列宁的名字虽然已经不陌生了,但一年里也只有一篇文章被部分摘译。1920—1921年,也即中共已开始创建,俄共和共产国际都开始派人到中国来帮助做宣传组织工作了,中文报刊上,连同陈独秀等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两年也只登了10篇列宁的文章或讲话,而且基本上都是摘译,内容也多半都是讲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经济问题、苏维埃建设的。真正和共产党的主义、方针、方法有关的,即讲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原则和方法的,只有《国家与革命》和《加入共产国际大会的条件》两篇,前者也只是摘译了第一章中两小节内容,后者是唯一由《共产党月刊》经由英文全文译出的。^①透过这些极其有限的摘译和介绍,要想了解俄国革命,特别是要想弄清楚列宁主义大概是怎么回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了解了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共一大发生的问题,比如花了太多时间纠缠于要不要联合民主派,党员能不能当议员和做官,以及会议到最后都没有能够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会议主持者所拟“纲领”草案的内容完全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等,显然也是有其特定的原因的。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或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的结果,怕是未必准确。^②

依笔者所见,除上面提到的外,至少还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者重视:

第一,中共一大的“纲领”制订与问题讨论,受共产国际二大相关决议的影响很大。中共一大会议未能正式通过的“纲领”草案,包括与会代表持续多天的争论,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着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展开的。一大召开于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正在全力以赴地批判一切摇摆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派主义”。其1920年召开的二大又刚刚通过了态度强硬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所有打算加入共产国际的政治组织,必须统一更名为“××(国名)共产党”,并与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及其思想主张划清界限,彻底决裂。该文件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经译成中文,刊发在《共产党》月刊第4号上,它显然对陈独秀临时指派的年轻的会议主持者和多数缺少这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与会代表,会形成极大的政治约束力。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上海直接负责帮助中共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并予以指导的尼科尔斯基,无疑也负有落实这一目的的使命。^③因此,会议讨论最终会聚焦在要不要彻底贯彻党的列宁主义性质这种问题上,几乎不可避免。缺少经验和应有威望的会议主持者会起草并坚持想要通过一个与苏俄及其国际共产党在理想诉求和革命方法上一般无二的政治决议,是可以想见的。

一般而言,要不要贯彻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也是这个新生的共产党组织这时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它也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在一大会议的争论中。已知12名与会者中四人有留日背景,国内大学在读或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四人,中等师范毕业三人,在读中学生一人。会议围绕着党要不要联合民主派,党员能不能担任议员及出任公职等问题发生的持续争论,其实也正是与如何理解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和共产国际二大相关决议的规定纠缠在一起。由于成立这个共产党,原本就是要模仿列宁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并且是要加入共产国际的,因此,任何有违《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所规定的意见和主张,政治上都是不正确的。参与争论且互不相下者,大都是有留学或大学教育背景的年轻代表,以他们对列宁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的有限知识,要想论证清楚在对共产国际决议条文的解读上究竟谁错谁对,也是不可能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外语能力较强、阅读并翻译马克思经济著述略多的李汉俊,会成了会上政治不正确的意见的代表。支持他的,也是陈公博等个别读过大学、有一定外语能力者。他们基本认同《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共产党性质及其

① 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查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等。

③ 马林明确讲:“因为自己从未得到过具体的任务指令,故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他只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参见马林《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1921年7月7—9日),《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

斗争策略的说明,却不了解也不认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关于必须公开拥护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赞成党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以及必须摒弃所谓爱国主义并与一切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彻底决裂等规定。

第二,一大参会代表理论水平、政治能力参差不齐,但这并不等于说早期共产党人都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缺少了解或了解不多。会议的组织 and 召集者陈独秀就是一例。如果不是因为陈因故临时不能回上海参加一大会议,会议的讨论及其结果理应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按照一大参加者提交给莫斯科的关于一大进程的书面报告,可知陈独秀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就是要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也因为他对会议有所设计和安排,因此,他无法回上海参会,也一定会设法影响会议相关决议的制订。因为,即使只是从他所负责任和他强烈个性的角度来考量,他也不会完全不在意会议可能形成一个怎样的纲领性文件,而不预先提供自己的意见。

1927年初,当时驻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出版的一份俄文刊物刊载过一篇概述中共历史的长报告,里面就谈到了这一情况。报告称,中共一大召开前陈因在广州主持教育工作一时无法离开,故专门起草了一份纲领草案,托人带去上海供与会者讨论。草案的内容主要着重于党员教育、党内纪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争取群众等问题。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可知,他特别提出要在这几方面达成一致并做出规定,是意在参照共产国际二大对各国党的要求来规范中共的组织原则及今后主要的工作方向。报告同时还说,陈在这个草案中明确提出,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①这一概要的介绍,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陈独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当下的需要及任务是有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能够反映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上。当然,会议后来发生的情况偏离了陈的设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此明显耿耿于怀。

仅就目前可见到的资料即可了解,光是在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期间,陈独秀就几度表示他对中共一大会议工作的不满。他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党员(指与会代表——引者注)并不明白自己的任务,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形成可以实施的“纲领”,“甚至没有(形成党的)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以至一大以后党的“工作是在没有纲领的情况下开展的”。他指出:只是到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党才得以“脚踏实地,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②这表明,陈独秀于一大后回沪出任中央书记时,没有收到会议主持者转交给他的任何经由一大代表集体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他读到过会议主持人起草并提交会议讨论,因争执不下未能形成决议的“纲领”草案,他也不认为那是一个可供实施的党的“纲领”,因而斥之为“悬在半空”,无法落地的空论。^③

第三,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未必都是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造成的,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对理论一知半解、张冠李戴造成的。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党内理论脱离实际最主要的批评,就是“照搬外国”,“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把理论当成教条。^④在中共建党之初,这方面的问题恐怕也是造成一大的讨论和“纲领”草案脱离中国实际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如同前文所说,当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刚刚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克思、列宁及其共产党方面的知识和读物的。即使外语好的,要弄明白那些基于欧美苏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资本主义问题的

^① 类似的叙述也部分呈现在张作霖1927年春查抄苏联大使馆所获《中国共产党简史》一文中,唯这段文字的详略两者稍有区别。见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马贵凡译,192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② 参见《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并参见李玉贞《中共一大文献辨析二题》,《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③ 陈独秀在私下里似乎也有过激烈的批评。据濮清泉回忆称,陈当面对他讲,一大代表倾向极“左”的张国焘、刘仁静等“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濮清泉《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2页。

^④ 参见《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下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383页等。

种种论述,都深感困难,更不必说多数只能阅读翻译过来的,连译者自己都不大确定准确与否的中文译本的同志们了。^①在这种情况下,搬用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名词、概念来讨论中国问题,必然会发生理论与实际严重分离的情况。

仅以一大“纲领“突出强调的”无产阶级“一词为例。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术语的汉译,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已经用到这一汉译名词。1919—1920年间,“无产阶级”一词在中文报刊上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用语了。但多数使用者,包括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仍旧习惯于使用他们更熟悉的“劳工阶级”或“劳动阶级”一词,因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当时条件下使用的局限性太大。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并无多少了解的多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多半并不在意这一概念的内涵的严格规定性,往往会把它与“劳工阶级”或“劳动阶级”相提并论。因为五四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劳心”“劳力”都是劳动,知识分子甚至往往自认就是这个世界上受国际资本家阶级压迫奴役的“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联系到马克思早就断言当今世界已经被资本阶级所统治,他们自然直接会得出结论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劳动者布满全地球”,做“资本家底奴隶”。要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让劳动阶级占得中心地位,就非得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提携多数无产阶级的体力劳动者,“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②

这个时候,即使是有一定外语能力,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接受度较高的陈独秀,也免不了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用来做认识中国问题的教条。阅读他的著述不难发现,自1920年9月初发表《谈政治》一文公开表明赞同列宁主义的主张以来,他对中国国情的看法就随着他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和对欧俄革命的了解增多,在发生改变。只是这种改变,不是更贴近中国实际,反而是离中国实际更远了。

9月初,他还在讲:对劳动运动尚在萌芽,劳工既无出版、结社自由,又无劳动保护立法的国家来说,恐怕还不是高谈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③两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有了变化。他公开撰文,质疑在华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主张中国现在不宜马上提倡社会主义,而应先注重发展教育和实业的说法。称:资本主义在欧美日本确实发展了教育和实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④中国为什么不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实业,还要去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呢?至于中国为什么不必再走资本主义的路,他的说法是“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⑤

进入到1921年后,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连俄国二月革命那半年时间也不需要去经历,完全可以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他的依据是,“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欧战以来,

① 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矛盾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08页等。

② 参见一粟《对于劳动节的感想》,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副刊,1919年5月1日,第1版;若愚《劳动者的权力》,《晨报》副刊,1919年5月2日,第1版《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国会友》(1920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150页等。

③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原刊《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原刊《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6页。

④ 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原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03页。

⑤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原刊《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79页。

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无比正确,即“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指资本阶级)一手把持;国家底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底一个委员会罢了”,而共产党一定要脱出国家的界限,谋求世界无产阶级全体的解放。实际上“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落后,劳工运动虽然幼稚无力,但“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各国同志也必定要给中国以援助。^①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泛泛地从中共建党开始就谈论早期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史实的角度是很难成立的。一方面,我们理当在研究那段特定时期的时候,将当时早期共产党人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称“马克思学说”)和“列宁主义”(当时又称“布尔什维主义”)加以区别,以便于我们能够更深入和全面地把握中共建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传播及其接受史的复杂面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原因、形式、方法及其过程,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接受史,因为这也是当年早期共产党人真正接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唯一的途径。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切地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可能具备建立共产党和实行社会革命的农业国中国,却能够产生共产党,且最终能够迈上社会革命的道路。不了解或不清楚这中间列宁主义所起的作用,恐怕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这种巨大的历史跳跃发生的逻辑和路径是如何形成的,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又是为什么以及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0241)

转型与塑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启示

江 沛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对20—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及执政,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的核心要素,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事。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辉煌百年史,艰辛探索,由弱到强,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本文侧重研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前后的艰难转型及重新塑型,并视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定型,中国政局演变的历史走向,都具有不遑多让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

一 国际因素

放眼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历程,自工业革命从英国兴起并波及欧洲大陆后,随着工业化技术的传播及欧美资本主义以对全球资源、市场需求为驱动力的四处侵略,亚非拉农业国家被无情地卷入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②在此背景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1922年2月9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44、349—350、427页。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